

史學叢纂要
國學彙纂之八

蔣祖怡編著
正中書局印行

史學叢纂要

第一章	史學略史(上)	九〇
第二章	史學略史(中)	九八
第三章	史學略史(下)	一〇四
第四章	史學名著(一)	一一三
第五章	史學名著(二)	一二九
第六章	所謂「史料」	一三九
第七章	史料之取去與史學的關係	一四九
第四編	餘論	一六三
第一章	注史與論史	一六三
第二章	史學之前瞻	一七二

第一編 緒論

第一章 「史」之意義及範圍

歷史是過去人類活動之成績的記錄；無論政治、經濟、文化，從萌芽一直到成熟，其間經過的過程，都由歷史記載下來，給後人以參考的資料。然而歷史的事實並不一成不變，時刻有新的發現；每一發現，往往將已成爲定論的史實推翻了。以人類的歷史與宇宙的歷史來比較，那是異常的渺小與短促的。以人類的歷史與有史以後能記載在簿籍上的歷史來比較，那更渺小更短促了。但是現代的人類，卻渴於知道一切宇宙的歷史與有史以前的歷史，同時，又希望能將已有的史實，成爲永久的定論，於是歷史這一種學問，便成爲荒蕪待墾的園地；而歷史學者的工作，也變成更辛苦更重要的工作了。

「史」字的本義，原不是現今所用「歷史」的意思。是古代一種工作者的符號，沿用爲官名。按漢代許慎說文解字「史」部下說：

史，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

但是許慎之說，不十分可靠。清代江永周禮疑義舉要中解釋道：「凡官府簿書讀之『中』，

故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獄訟之中，皆謂簿書，猶今之案卷也」。清羅振玉氏解釋鼎文，所說亦同：「掌文書者謂之史」。可見史乃是一種職司之名了。又古代「史」使「事」同字同義，「史」字，召尊鼎及豆圖敦均作「𠄎」，又古文作「𠄎」，象手執簡立於旂下史臣奉使之義。「事」字甲骨作「𠄎」與「史」字同。總上看來，古代之所謂「史臣」，乃是掌文書而兼使者之人。所以說文「事」字下說：「事，職也」。這「史」「事」均無「史乘」「史書」的意思。而英語的 History、法語的 Histoire、德語的 Geschichte，均由「故事」(Story) 的意思推行出來的，亦不過有記事的意思而已。

我國古書中，禮記曲禮方有以「史」為正式官名的話：「史載筆，士載言」。注解中說道：「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又禮記注：「勳則左史記之；言則右史記之」。可見當時已有史官的設置，并且已分化為「記言」與「記勳」兩種職司。據說我國之有史官，始於黃帝之世，世本中說：

黃帝之世，始有史官，蒼頡沮誦居其職，夏商分置左右。

玉海中亦稱「昔四史防於黃帝，五典建於蒼頡」。蒼頡沮誦是否為人名，雖則尚有疑問，但傳說之中確有史官始於黃帝之一說。至周則史官之分化，更為進步，如周官中所說「設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又治官有女史」。

我國既有史官專掌史職，則最初的史書，皆成於史官之手。尚書是堯到秦穆之史，魯

秋是東周魯國之史，孟子中稱：「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則各國均有史書，也均有史官。但漢書藝文志中沒有「史部」，列史書於六藝春秋之後，到隋書經籍志才立經、史、子、集四部，而列「史」之一目。因為後人尊六藝為經，所以隋代經史分而為二。古人有「六經皆史」之說，其說倡於明 卓吾之焚書而大著於清 章學誠的文史通議。
章氏謂：

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

其他如龔定盦 古史鈎沈所說：「六經者，周史之宗子也」。張采田史微中也說：「自孔子以上，其學術政教，一言以蔽之，『史』而已矣」。馬氏釋史序中亦有此種說法：「書虞作史，而綜為經，兩漢襲經而別為史，蓋經即史也」。其實六經中的尚書春秋，明明是古史，列入經部，頗不妥當；進一步說，「經」的名目，是否妥當，也是有待研討的。

春秋戰國之世，正是史學發達的時候，史官的設置，較以前為多。左傳中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之；晉 趙盾 靈公之事，太史 董狐書之；鄭公 孫 墨與盟，使太史書其名；而晉又有太史 屠泰，楚有左史 倚相，齊有南史，魯有外史 史記，秦 趙 澠池之會，皆令御史書之，孔子求周史，得百二十國寶書，史通引墨子：吾見百 阿 春秋：這均是那時的史官和史書。

秦有太史 令 胡毋敬，漢代置太史，以司馬談為之。宣帝以後，修撰之職，以他官領

之，因此以後的太史，只知「占候」了。自東漢到唐代，多隸於秘書（詳見杜佑通典）。至宋代始有正式的史館。馬端臨文獻通考：「宋制，監修國史一人，以宰相爲之。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凡國史別置院以廢之，曰編修院」。這是宋代史館的制度。續文獻通考：「遼國史院，設官曰監修國史，四史館學士，曰修撰，曰修國史……元以翰林兼國史」。又淵鑑類函：「明初設起居注，尋設翰林編檢等官，皆充史官」。這是宋以後史館的大略情形。

我國史館由國家設置，故官撰的史書很多；同時學者又有私人的著作，所以「史皆」這一部分，汗牛充棟。總而論之，長處雖有，短處卻也不少。現在依作者的立場來論列他們作史態度的得失。同時也可以知道他們論史的標準。今依類別之，大致可分作七種：

（甲）哲學的歷史觀——哲學的歷史觀者，常側重於精神生活而忽略了物質的生活。同時以爲歷史的目的在乎「示真」，所以「史」乃是一種千古銳今的哲學。如老子中所說：「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班固漢書敘傳中也有這一類的見解：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實德於百五；故採舊前記，綴輯所

聞，以述漢書。

他提出「德」和「名」字，來作「史的哲學」之標準；自漢以後，我國史書作者，大抵均有如此主張。又如馬端臨文獻通考序中所說：

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述，十七史之記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

不過歷史之發現，自常能助哲學的證明，或者竟能產生一種新的哲學的。所以漢書藝文志稱老子的哲學是出於史的。「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所以哲學的歷史觀，在許多歷史觀念之中成爲有勢力的一派。

(乙)道德的歷史觀——史所以記載過去的事實，有許多作者，因此認爲史正足以作「殷鑒」的東西。所以司馬光的通鑑，稱爲「資治通鑑」，是帝王們所專用的以道德爲標準的歷史教科書。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有史德篇，提出了「史德」這個名詞，以爲作史者個人的德行心術，亦有關於所作之史：

史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蓋欲爲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傳，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

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毗於陽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貴於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

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毗於陰矣。陰陽復冷之患，來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偏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爲文辭，至於善戰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

他以爲史的可貴，即在乎審德明禮，定善惡，明道德，作後人的殷鑒的。這一類主張，在章氏以前已有很多的人說過了。如易繫傳：「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爲德」。向書無逸：「嗣王其監於茲」。酒誥：「我其不大監撫於時」。即孟子中亦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太史公自序：「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希臘史家也有「史乃政治家及將領之領導」之說。史的价值，並非全在道德之訓練，也未必古者即可取勝於今。而我國史學界上此派却占有重大的勢力。

(丙)宗教的歷史觀——我國史書中常插入多量神明的事蹟，而「天命」之說，到現代還盛行於民間。封禪祥符之說，又向爲歷史家所不肯割愛的材料。堯典首稱「欽若昊天」，舜亦禋類肆望，乃即帝位。皋陶之人代天工，太甲之顧祖天命，均以「天」爲無上威權者。至漢書而其說更盛。漢書序傳引班彪王命論稱劉氏承帝祚，及其祥符，而斥時俗曰：「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又說：「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而已，味道之腴，神之所之，名其舍諸」。晉史立鬼神傳，專記鬼神之說，史通中也有「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的話。其他如左傳中所載彭生豕見以及卜筮等的神驗。每代帝王及有名人物的傳記

中也有很多的神奇故事，如漢高祖之斬蛇等。又如明史李自成傳：

自成謂真得天命，牛金星率販粟三表勸進，乃從之。令撰登極儀，諷吉日。及自成升御座，忽見白衣人長數丈，手劍怒視，座下龍爪震俱動。自成恐，亟下。鑄金璽及永昌錢皆不見。

大概漢高祖命中注定可以做帝，於是天賜蛇來給他斬；李自成命中無稱帝之福，於是天意不准登位。又同書黃綬傳：

官至四川左參政，按部崇慶。旋風起，輿不得前行。綬曰：「此必有冤，吾嘗爲理」。風遂散。至州，禱城隍神，夢若有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倚山爲巢，後臨巨塘，僧夜殺人沈之塘下，分其貲，且多藏婦女於窟中。綬發兵圍之，窮詰其狀，誅僧，毀其寺。

這與民間傳說包龍圖斷獄的故事差不多。但這一類記載，每一代的正史中，都容易發現到。因爲我國社會中一向充滿着神的神祕，所以作史者也視爲異珍地將這些動人的材料記載到史書中去，而評史者又往往以果報爲論史的根據。

（丁）文學的歷史觀——我國歷史作者，他們對於著作上的用心，不但對於史實加以注意，并且極留心於文章，使它有文學的美質。同時作者作史的目的，也竟有欲以文采傳後世的。史記是我國最偉大的一部史書，作者司馬遷在自序中稱作史的本旨道：

有能昭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又在與任少卿書中，稱作史之目的是：

恨私心有所未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

足見他底作品是有意於文學上的價值的；因此史記一變而爲一部文學的歷史作品。當然以史書而專重文學技巧，往往有不明白，或者不翔實的弊病。所以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中批評道：

史記意在行文，不在記事。

這批評實在是很公允的，也指出了史記一書的重大缺陷。班固的漢書，也有和司馬氏同樣的傾向，漢書序傳稱：「僕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則以史的著述爲自娛的東西了。所以傅玄譏它「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也是偏重於文學的緣故。以史漢兩書來作比較，漢書較少文學的價值。但以史學的立場看來，漢書比較是純粹的史書。所以魏禧序十國春秋中說：「遷僅工於文，班固則密於體」。

反對以文學方法來作史的很多很多。以爲工文則害事實；劉知幾史通疑古篇：

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推者難詳。

文史通義史德篇；反對重文的史書道：

溺於文辭，以爲美觀之具焉。是不知其可也。

文學與史學自有其關係，但不能偏重文學技巧，而歪曲了史實，忽略了事實的真相。如果能在保持歷史之真實性以外，而更有文學的趣味，那末決無「溺於文辭」之病了。

(戊)偉人的歷史觀——歷史是記載整個人類社會的活動的，但是在專制政體的環境裏，因改易朝代由於個人地位之改變，於是史書的記載也便以一二「偉人」為中心了。一方面也由乎祖述儒家思想之「憲章文武，祖述堯舜」，提出一個標準的人物來記載。如論語「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孟子之贊孔子：「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史記之中，也有依作者心目中崇拜的一二偉人，一一特立標示。故趙翼廿二史劄記斥他列項羽為本紀之不當；王安石稱他入孔子為世家之錯誤，為「自亂其例，多所抵牾」。不知作史記者的本意，是故意表揚這兩個人的。本孔子對哀公問所說「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意思。其最大的缺點是重在偉人個人的事蹟，而忽略了人與人所組成的社會活動情形。只是切面的，片段的記載罷了。

(己)經濟的歷史觀——一切社會關係，均依經濟情形而改變。而尤由於生產方法之變遷。所以社會之進化與經濟情形有關係。因此歷史的記載也不能忽略於記載一切經濟變遷之情形。我國以農立國，不喜道財，所以對於這一點，不甚重視。古史中有禹制土田，桀還有無；戰國之時，經濟情形突變，所以當時對於經濟情形，較為重視。管子乘馬篇：

聖人所以為聖人，善分民也。

又說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社會的安定，必先由於經濟情形的寬裕。經濟不寬裕，那末一切社會情形也因而混亂起來，非政治力量所能遏止的。孟子是儒者，他對經濟情形亦頗重視：

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商君書中也有「民衆無制則有亂，聖人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的話，與孟子所說略同。史書中如漢書有食貨志。史記有貨殖列傳，惜所記不詳。但後人也有以爲記錄商販之事爲有傷大雅的，如王鳴盛所說：

馬遷自敘既下於理，家貧不足以自贖，故傳貨殖；班氏譏其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已不得其情，乃班史仍踵故轍，傳貨殖，何也？且彼固諸語發憤之所作，班願易以莊語，取市井賈人臚列滿紙……

他以歷史爲莊重尊嚴的東西，只可記載帝王將相的大事。而不知整個社會的進化與退化，安全與擾亂，和「市井小人」不無關係的。戰國時代哲學之所以發達，經濟制度的改變實爲一重要的原因。

(庚)地理的歷史觀——黃帝畫野分水。大禹治水，乃有禹貢。周官施治，最重地圖。班固漢書，始有地理志，以後正史均宗其意。漢書食貨志稱：「立民之道，地著爲本」，

亦有重視地理之意。但往往論地理的別成專名，不錄於史書之中，如王象輿地紀勝、樂史太平寰宇志等。而與歷史合爲專書的，惟清代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他序中說地乃不變之體，而史是無定之事：

不變之體，而爲至變之行；一定之形，而爲無定之準。

吳興祚在方輿紀要序文中也論及：

學者以史爲史，而不能按之輿圖；以輿圖爲輿圖，而不能稽之於史。

當然不明地理的形勢，是無從研究歷史的。地理與歷史也有很密切的關係。但是這兩者的任務各各不同，全以地理爲歷史，似乎也覺不妥。史書中所以有地理志，也是讀史者所先知道的當時地理的概況而已。

總上七種觀之，作史的態度各各不同。此外，尚有「社會的歷史觀」，以爲歷史的一切記載，由於社會之變動，正史中的「志」體頗近於記社會動態的。文中子：「史之失，自馬遷始，記繁而志寡」。他就重視社會活動之記載了。江淹也說：「修史之難，無過於志」。傳記以一人爲綱，容易著手；志記載整個社會之情形，頭緒紛繁，不易著筆，而其重要性卻遠在傳記之上。又有「政治的歷史觀」，我國史書，所記政治，不及全部，但記帝王名人個人之言行，範圍非常狹小。「科學的歷史觀」以歷史爲單表達事體之本質，而作後人批評之對象者。這一派說法正和文學的歷史觀相反。王肅稱史記不虛美隱惡，公羊傳

之稱爲信史，董狐之稱爲史筆，皆與此說相近似，但不能擴大其範圍耳。

歷史的作品，因作者立場觀點的不同，他們底作品中也各顯露出自己底主張來。如果歷史只是暴露事實的真相的，那末便該摒棄文學的哲學的宗教的歷史觀念，使它成爲一種專門的學問。綜合各方面有關史實的材料——人事有關於社會的活動者，史的地理情形，一切社會的風俗與民情，以及當時政治經濟的動態——來寫成史料。它是理知的事業，在不斷變進之中，以說明人類進化之情形爲任務；同時以理想的方法考求事物的如何至此，與何以至此，以爲人生及他種學問之致用，而一切粉求其「真」，不單是記憶的記載，而是理性人生的說明。在可能中找出人事中的公例來。——這是歷史學者當前的任務。

第二章 史書與史學

我國記史之書，浩如煙海。隋書經籍志繼經傳，於是才有「史書」一目。其較可信現代尚存的最早史書，當推尚書。尚書之外，名目尚可稽考的還很多很多。書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注「殷先世有册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左傳文公二年，晉狼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注：「周書也」。六年，史駢曰：「前志有之，敵惠敵怨」。成公四年，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十五年，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曰：「鄭書有之，安定國

家，必大焉光」，注：「鄭國史書」。昭公二年，范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十二年，仲尼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十三年，左史倚相能讀典墳。十五年，景伯曰：「孫伯歷司晉典籍，爲大政，故曰籍氏，辛有二子，蓋之，晉於是有董史」。二十六年，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二十八年，晉司馬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煩有徒」。注云：「古書名」。哀公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使周人出御書。又公羊傳莊公七年不修春秋，注云：「謂史記也」。國語晉語司馬伏對悼公曰：「羊舌肸習春秋」。注「春秋，周史之法也」。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仇善抑惡；教之故志，使之廢興者而戒慎；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注：「如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若魯春秋、晉檮杌、楚乘」。「外史三皇五帝之書」。注：「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

以上是古代史書之名，見於經傳及注解者。

此外，如家語：子夏反衛，見譚太史記者言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呂氏春秋夏太史終古考圖法出奔商；商太史向擊考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屠乘以圖法歸周。——以上是古代史書之見於諸家傳記的。

又如史記陳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晉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後漢書班彪傳，其略論曰：「唐虞三代有史官，

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三國吳志有國史」。韋駘曰：「五帝三皇，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史通引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以上是古史之見於後代者。但其書已亡佚，不能見其真相。

至今尚託爲古代之史的，如逸周書，隋志稱汲冢書，隋唐志均以爲是晉太康二年得於魏安釐王塚中。但晉書武帝紀及荀勗束皙傳載汲冢人不準所得竹書七十五篇，具有篇名，無所謂「周書」。又史通所引諸事，今本竹書無之，足見今本已不是原本了。杜預春秋集解後序載汲冢諸書，亦不列周書之目。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斷爲戰國後人所作：

周書載有太子晉事，則當成於靈王以後，所云文王受命稱王，武王周公私計東伐，俘馘殷遺，暴殄原獸，輦括寶玉，動至億萬。三發丁車，懸紂首太白，又用之南郊。此皆古人必無之事。陳振孫以爲戰國後人所爲，似非無見。然左傳引周志「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又引書「慎始而敬終，終乃不固」，又引書「居安思危」，又稱周作九刑，其文皆在今書中，則春秋時已有之，特戰國後，又輾轉附益，故其論駁難耳。汲冢所發現者尚有穆天子傳，左傳稱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車轍馬跡焉。此書所載，卽指此事。簡明目錄稱這書乃小說之一，不得視爲正史：

汲冢古本，晉郭璞注。此記周穆王西行之事，爲經典所不載，而與列子周穆王篇，互相出入。知常時委巷流傳，有此雜記。舊史以其編記日月，皆列起居注中；今改